
“战时”的和谐共生：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

1

曹大明

（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摘要】：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土著与客民内涵发生变化，不能简单地将其关系描述成土家族与汉族的关系。这一时期，土客尽管存在族群意识和边界，但通过国难当头时的凝聚，二者形成了“战时”的和谐共生局面。武陵民族关系研究不能简单套用以汉人与少数民族遭遇作为历史演进起点的传统叙事框架，而应以空间、历史、人群为切入点，全面、深入、动态地研究各民族的形成、演变及其关系。

【关键词】：武陵地区；土著；客民；和谐共生；族群关系；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8）05-0063-05

人类学族群研究业已证明，完全基于体质、语言与文化界定族群是值得商榷的。界定族群不能只依赖外在的文化符号，更应注意其成员选择和建构文化的心理。在不同的心理归属之下，族群边界是流动的，维持边界的文化符号也是可选择的。受人类学族群理论影响，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的族群形成了一条与传统民族史研究不同的路径。王明珂在消化、吸收族群边界和集体记忆理论基础上，对汉藏之间的羌族历史、认同变迁等进行研究，并以此透视作为国族的中国从传统华夏帝国到中华民族的变迁。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郑振满等学者对华南的族群分化与区域社会变动进行研究，认为生活在华夏边缘的“他者”，不能仅按溯源的方法进行探讨，也可从具体时空出发，分析他们对“自我”及生活在其周边族群的认识、对华夏帝国的想象及在此基础上带来的文化实践。历史上生活于武陵地区的族群较多，但宋元后主要围绕土客而展开。受传统民族叙事话语影响，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多被描述成土家族与汉族的关系。同时，多数研究集中于明清时期，鲜见全面、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土客关系的成果。因此，本文拟从土客关系的角度，对该地区族群关系进行研究，既可为土家族族源研究提供新思路，也可为中部地区民族关系研究提供新视角。

一、“土”非“土”：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居民

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居民主要分为土著汉民与非汉土著。土著汉民主要是清代及以前迁入该地区并已落地生根的汉民。他们主要居住于平坝、丘陵及水路交通沿线。特别是在县城、集镇、码头，更是以土著汉民为主。故时人有熊溪及辰溪麻阳之下“概为汉籍”^{[1]59-60}之言。熊溪及辰溪麻阳之下乃交通较便利之地，这些地方的居民“概为汉籍”说明，湘西沅水、澧水流域交通相对便利的县城、集镇确有不少土著汉民。

与湘西类似，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水路交通便利之地也有不少土著汉民。对此，地方文献给予了一定记载。1934年《湖北县概况》详载鄂西南各县人口及风俗时，鲜有言及“土司之裔”的状况，可见当时鄂西南土著多汉民。渝东南石柱“厅境土

¹收稿日期：2017-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主体视野下武陵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振兴发展研究”（18BMZ075）。

作者简介：曹大明，男，三峡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历史人类学与族群关系。

庶皆汉人著籍，并无他种杂处”（清宣统《石柱厅乡土志·历史》），黔东南思南“各属蒸黎”“全系汉族”（民国《思南县志稿·风俗气候》）。尽管受清末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一些“汉化”较深的非汉土著被当成了汉民，但同时也说明，这些地方确实多土著汉民。可见，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各地都有不少的土著汉民。

土著汉民之外，非汉土著则经历了从“蛮夷”到“少数民族”的转变。他们尽管多被视为“同化了的民族”，但仍是区别于汉的群体。这些非汉土著主要有“苗”“土”“仡佬”“傜人”“侗家”“冉家蛮”“回回人”等。

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苗”族群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明清时期的称呼。这些称呼既有泛称，也专称。“苗瑶”是外界对诸土著“蛮夷”的统称，但其种类繁多，包括“侗”“瑶”“僮”“仡佬”等。《湖南民俗风情报告书》载：“苗之别种曰侗，曰瑶……今在湘境者统称苗瑶。”^[2]《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论及贵州苗族时也曰：“中国西南民族虽名目繁多，然可分为苗瑶……苗人属苗瑶类，仲家属泰掸类，侗属藏缅类。”^{[3]17}

“苗人”“苗蛮”“苗群”也是民国时期武陵地区苗族群的泛称。《湖南各县调查笔记》载，通道“汉福佑，苗福祥。汉苗各半之”，凤凰“苗人不分男女，皆以布缠头，冬夏不去”，保靖人“向分土、苗两种”^{[4]381}。《酉属视察记》载：“（境内）汉苗杂居，风俗朴淳，惜性好残杀……虽至今日，此种蛮风，尚未改掉。”^[5]民国《铜仁府志·地理志》则以“苗蛮”称呼“苗”。此外，马长寿先生1936年发表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则将湘黔“苗”表述为“苗群”。

与泛称不同，“生苗”“熟苗”“红苗”“黑苗”具有特定的意涵。“生苗/熟苗”是据“汉化”程度差异对苗民所作的区分，此区分是明清分类传统的沿袭。“红苗/黑苗”称呼则是“他者”按照服饰颜色对苗族群所作的分类。《湖南全省社会调查》载：“苗中又有红苗、黑苗、土苗之分。”^{[3]382}在此，“红苗”“黑苗”是“纯苗”，而“土苗”不是“苗”，而是“土家”。此外，黔东南西阳、秀山等县也“多红苗”^{[3]23}，由此可见，“红苗”分布之广。

除了“苗”族群，民国时期非汉土著还有以“土”字命名的社群，他们主要是“土民”“土家”“土人”“土苗”“土蛮”。这些称呼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湘西“土民”“土人”“土家”指的是一个具体族群，否则他们不会与“苗”并称^{[6]381}。鄂西南来凤、鹤峰等县尽管残存“土家者，土司之裔”（民国《咸丰县志·氏族志》）的族群分类，但多数地方的土家“因时间太长，与汉族通婚早”，已“与汉族无显著差别”^[7]。渝东南西阳、秀山等县“土人”“土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虽保留一定的土家语和风俗习惯，但当地所言的“土人”“土著”并不是与“苗”并称的族群，而是泛指“当地人”，故陈济涛先生《酉阳苗族调查》只有“苗汉”之分。与湘鄂渝三地略有不同，黔东南之“土民”是非汉土著的统称，“土人”只是其中一种。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土民”种类繁多，有“苗”“百濮”“汉族同化者”“种类不明者”等七类。其中“汉族同化者”的“土人”，主要分布在邛水司、省溪司、铜仁府、乌罗司，而省溪、铜仁府、乌罗司就在武陵地区。

此外，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非汉土著还有“仡佬”“侗家”“傜”“回回人”等。“仡佬”不一定是苗族，但常被视为“熟苗”，他们主要分布在湘西、黔东南。“傜人”“傜”主要分布在怀化溆浦、泸溪、辰溪、黔阳等县。《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载：“溆浦、黔阳、武冈、道县、永明等县有傜人。”^{[3]23}溆浦、黔阳即属今怀化市。

“侗家”“僮人”“峒人”多置于“苗”称之下，《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有“苗之别种，曰侗、曰瑶、曰僮”之言，清末《靖州乡土志》也认为“峒人”是“花衣苗”一种。但也有研究将其独立探讨，如陈赤子先生的《侗家中的鼓楼》，凌纯声、芮逸夫先生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特别是后者之研究，更是明确指出：“侗家如与今日广西的三江、龙胜、融县、罗城、河池诸县的侗人为同类……而不属于苗。”^{[3]22}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也把“峒人”从“苗”中独立出来，将其视为“汉族同化”的“土民”。其中思南府、石阡府“峒人”就在武陵地区。此外，据族谱和民间传说载，明清鄂西南、渝东南也有落地生根成了土著的“峒人”。

“冉家蛮”主要分布在沿河、松桃、酉阳等地。民国《贵州通志》援引嘉靖《贵州通志》载其分布、生计、习俗曰：“冉家

蛮，在思南府沿河司治，在府之东北，性凶悍，不憚深渊猛兽。”上述文献虽是援引，但也呈现了民国时期“冉家蛮”之基本情况。

“回回人”“清真回部”主要分布在常德、桃源等地。《靖州乡土志》载：“回回人，丁氏源流。”该志“氏族”又据族谱载：“由西域大食内徙。元末居金陵，值鼎革，佐明太祖南征楚靖，授武德将军，正千户……凡分四支，今传十八世。”“清真回部”即今维吾尔族先民，他们系明初“征蛮”迁入武陵并定居，主要有剪氏一族。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土著既有汉民，也有“苗瑶”“土民”等非汉族群。土著汉民主要是清以前迁入，历经清代特别是“改土归流”后的融合，他们大多业已落地生根。非汉土著不仅出现了称呼上的转变，而且习俗也有显著变迁，甚至被视为同化的民族，但他们仍是客观存在的族群。这种存在，既是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民国时期的客民所面临的族群关系场域。

二、客非汉：客民的迁入

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客民主要有三类，分别是战乱迁入的客民、营谋职业的商人、西方宗教传播者。战乱客民因战争迁入，该时期武陵地区战争较多，主要有“讨袁护国军”和“北洋征滇军”激战湘西、主客军阀混战、红军战略西移、抗日战争等，前三者给武陵地区带来的主要是灾难，后二者不仅带来了革命的希望和胜利的曙光，而且输入了一些先进技术和人才。全面抗战特别是武汉、常德会战后，大批民众逃亡、转移至西南地区。武陵地区由是成了民众西迁的主要通道及目的地。这些民众，既有穷苦百姓，也有政府机关公职人员，工厂、矿山、医院、高校、科研机构中各类科研、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商人及伤残军人等。1938年，湘西在省主席张治中视察后，陆续接收了大批的难民。《湘西州志》载，1942年“州境各县共设难民收容所7处，收容难民8228人。”^{[8] 283}鄂西南在湖北省政府西迁后，人口更是骤增。以恩施城区为例，抗战前人口仅3000人左右，武汉、宜昌沦陷后，人口骤增至15万人。与湘西、鄂西相比，抗战时期渝东南、黔东北迁入的难民相对较少，但仍对地方人口增长具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战乱客民迁回了原地，但仍有一部分留在当地安家落户^{[9] 99}。这些因战乱迁入的客民，主要以汉民为主，同时也有少量非汉客民。常德回族中的钟、钱、哈等姓多是抗战初期从江苏、安徽等省逃难定居的^[10]。恩施建始苗坪和细沙等地的满族即是抗战时期从北方诸省迁徙而来，特别是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时，部分回、满、蒙古等非汉客民亦随之迁入恩施^[11]。

除了战乱迁入者，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客民还有营谋职业的商人。特别是抗战时期进入该地区营谋的赣、粤、闽等地的客商较多。这些客商，既有坐商，也有行商。他们经营的商品既有大宗的桐油、生漆、茶叶，也有百姓日常所需的小商品。他们把地方盛产的土特产品通过船只运往区域外，又把外地产品运回武陵地区。湘西慈利县城“有丝烟铺十余家，当铺数家，皆闽、晋人所经营”^{[12] 616}，永定县城在武汉失守后也是“外商云集，商店剧增”^[13]。所里（今吉首市）湘川公路通车后成了湘鄂川黔四省进出口物资的中转站。抗战期间，当地商旅辐辏，人货游资云集。与湘西类似，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一些城镇、集市也云集了大批客商。鄂西南江西商帮主要经营生漆、桐油等山货；汉阳帮以经营汉货、布匹为主；四川帮主要经营食糖、纸张，收购药材；河南帮则以经营百货、土布为主；渝东南客商商号主要有“茂生园”等；黔东北铜仁城（现碧江区）江西商号有“德顺隆”等，湖南商号有“刘宝记”等，湖北商号有“集庆长”等，四川商号有“裕黔公司”等。除了国内客商，也有一部分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进入了武陵地区。1916年前后，美国“美孚行”、英国“享达利钟表公司”等洋行买办相继涌入铜仁，收购当地及周边所产矿产和农副土特产。1931年，美商在所里开设“正大公司”，1933年，又开设了“义瑞公司”。

商人之外，民国时期迁入武陵地区的客民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西方宗教传播者。该群体人数不多，但对改变民众宗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天主教在康熙年间传入武陵地区，随后逐步扩散。民国时期天主教已传入武陵腹地，湘西永顺、保靖、龙山、古丈，恩施利川、建始、来凤等地已有神父传教，并建有教堂。传教的天主教神父，虽有不少本地的，但多数来自西方。如乾隆十七年（1724年）至1952年间，在长阳担子口堂口任职的138位神父中，外籍神职人员多达104人，分别来自意大利、比利时等国^[14]。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新教传入武陵地区相对较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有数位传教士在常德、辰

州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武昌伦敦教会派英国人孙荣礼到常德等地成立伦敦会。《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传教受到清朝地方政府保护，各国传教士争相涌入武陵地区。中华基督教会从长沙传入沅陵，再从沅陵传入永顺、保靖、龙山，后来传入来凤、宣恩等地，建教堂数十处。

由上可见，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客民主要是战争、营谋或传教迁入的。这些客民虽以汉民为主，但也包含一部分非汉民，有的甚至还是来自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因此，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客民并不一定都是汉民。

三、“战时”的和谐共生：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的发展

民国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该矛盾之下，武陵地区的土著与客民，众志成城，共御外敌。通过国难当头时的凝聚和政府土客政策的推动，武陵地区土客关系得到较大发展，形成了“战时”的和谐共生局面。

1. 族际通婚加速。族际通婚是族群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尽管存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15]，但与清代相比，土客通婚比较频繁。特别是土客杂居的地方，通婚更是普遍。湘西土客混杂区洪、梁等姓“或妇纳苗女，其生易繁，转迁而既入苗之巢穴，遂变为苗也”^{[1] 65}。永顺县凤栖寨及附近土家族和汉族也是相互来往、相互通婚。此外，“苗疆”也有不少土客通婚案例。否则，《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不会有“纯苗有吴、龙、廖、石、麻五姓，其杨、施、彭、张、洪诸姓，乃外姓人赘于苗而习其俗者”^{[3] 93}之说，石启贵先生不会有“间有汉娶苗妇者”、“汉嫁苗族者”^{[16] 221}之言。尽管该情形“实非正式”，但也说明当时“苗疆”确有苗民与汉民通婚。苗民在苗疆是土著，汉民是客民，苗汉通婚既是民族通婚，也是土客通婚。土客通婚的加速，一方面与国民政府土客融合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包括土著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倡导、呼吁有密切联系。1936 年，石启贵先生与石宏规、龙辑五等苗族知识分子在《湘西苗民经济建设方案》中即要求政府“破除汉、苗界限，实行汉、苗通婚”^{[16] 686}。

2. 文化融合加强。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土客文化融合日益紧密，其融合存在“互化”两个维度，但主要以土著“客化”为主。《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载：“今日苗人家庭生活，逐渐同化于汉人，即婚丧仪式多效汉俗，仅保留若干苗俗的遗留而已。”^{[3] 93} 陈心传补编《五溪蛮图志》时详载了当时“五溪蛮”风俗之变迁。文中“僇人”“仡佬”“苗民”“苗人”乃“五溪蛮”之余绪，是典型的土著；汉民、“民家”多外来客民。“五溪蛮”服饰、居住、宗教、丧葬礼仪等方面的“汉化”即是土著的客化；汉民、“民家”“渐染苗俗而使之然”则是客民的“土化”。此外，一些方志、调查报告也显示，与客民相比，“土家”尽管存在一些“异俗”，但他们之间的融合远大于差异。龙山“最信佛道，喜拜偶像。迎神赛会，风气犹昔”。永顺“婚嫁”“丧祭”与各县风俗“大体相同”^{[4] 510}。作为族群标志的语言，经历土客交流后，“近世土人能操钟音者十无二三”（民国《永顺县志·地理志》）。

与湘西相似，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其他地方土客文化融合也在加快。鄂西南非汉土著因受汉族客民影响甚深，族群文化已寥若晨星。长阳西宁乡一带虽残存婚礼唱“十姊妹歌”，宴会喝“咂酒”，但多数习俗已与汉族客民无异。渝东南酉阳苗人“酋长”与客民通婚后，“始渐同化，故其语言中，虽夹有土语，但细心听之，仍可听其意旨特征”^[17]。松桃“苗蛮”尽管“率以寨计”“自为风气”，但“其与汉民居相近者，言语皆与汉民同”（民国《铜仁府志·地理志》）。松桃之外，黔东南其他各县的土著习俗更是深度“客化”。

3. 区域经济“战时”繁荣。二次鸦片战争后，内陆口岸开埠通商，英美日等列强沿长江航线深入武陵地区，倾销商品，传统手工业遭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列强廉价收购桐油、茶叶、生漆等土特产品，掠夺矿产资源，刺激了桐、茶种植业和榨油、木竹加工与矿业的发展。伴随城镇商业和集市贸易日益兴旺，外商机构亦进入武陵地区。由是，各种行会组织、商会洋行云集，商业渐趋繁荣。慈利县城“有丝烟铺十余家，当铺数家，皆闽、晋人所经营”^{[12] 616}。1931 年、1933 年，美商先后在所里开设了“正大”“义瑞”两家公司。他们抢收土产，倾销洋货，湘西的桐油、茶叶等土特产品因此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许多国内商人也以经营桐油而起家。民国初，保靖县城 31 家土产山货行，全部以经营桐油为主。随着商品交换日益扩大，非汉土著从商者也日益增多。花垣紫儿寨土千总石文魁嘉庆年间就在县城开办商行。所里苗族商人石安文办的桐油作坊，雇有 10 多个工人

轮班榨油，拥有资本数千银元。抗战前夕，泸溪浦市、龙山里耶、永顺王村、花垣茶洞、乾城所里、古丈罗依溪，市面繁荣一度超过县城。战前随着桐油的发展，永顺王村五里长街有大小商号 204 户，每年在此集散桐油达 700 多万斤^{[8]835}。

鄂西南、渝东南、黔东的城镇、集镇贸易也日益兴旺，商号云集。该时期鄂西南形成了巴东野山关、五峰渔洋关、长阳资丘、建始花果坪、利川汪家营、咸丰清水塘、来凤百福司等多个规模较大的集镇、集市。渝东南形成了以乌江、酉水为枢纽，以龚滩、龙潭、西沱、郁山、洪安为主要集散地的局面。黔东北集镇以锦江、乌江河运为枢纽，以铜仁为集散中心，云集了赣、湘、鄂等地商贾、商号。城内店铺、茶楼、酒肆等数量多达 60 余家。

抗战全面爆发后，伴随东中部地区一些企业西迁，沦陷区难民与土著共同开办工厂，区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外也机关、商户和难民不断涌入，湘西一些交通方便的市场异常繁华。泸溪、凤凰、乾州、茶洞等集市在该时期增建了街道，拓宽了市面，商户更是大幅增长。据 1915 年税务登记，今湘西州境内有商户 900 余家，1942 年增至 4000 多户^{[8]861}。鄂西南在湖北省政府迁恩施后，工商业有较大发展。工业方面，1943 年迁入或新建的工厂有硫酸、造纸等厂，职工 1000 多人；商业方面，鼎盛时期的恩施城区商号、店铺达 873 家，比战争前增长近两倍^{[9]283、564}。渝东南与黔东北经济抗战时期也有较大发展。黔江 1937 年川湘、黔咸公路通车后，物资交流加快。抗战时期，大批金融机构和商贾进驻，一时官商民商星布城镇。1944 年，私营商号拥有 5-10 万元（法币）资本的 14 家，10-30 万元的 12 家，30 万元以上的 10 家，5 万元以下的 26 家^[18]。黔东北在铜仁成立了贵州矿务局汞业管理处，承办开采铜仁汞矿业务，同时还兴办了一批私营工商业。此外，纺织、造纸等行业均有所发展。城区工商户 800 余户，从业人员 1000 多人，资金 1 万银元以上者 30 余户^[19]。

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经济因战争而兴，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衰弱。抗战后，随着军队撤退、政府机关搬迁以及工厂、难民回流，区域经济出现了较大回落。抗战时龙山里耶有纱布店 26 家，战后倒闭 12 家，余下的也是经营惨淡。永顺王村原有坐商 204 户，战后市场冷落，全镇坐商仅剩 16 户^{[8]790-791}。黔东北铜仁官办和民营工商企业半数以上于 1945 年底也外迁或停业，加上人口大量外迁，原先兴旺繁华的商业也骤然消逝，商品市场日趋冷清。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经济变迁说明，区域经济与国家形势、政策支持以及人口流动等因素密切相关。

四、结语

长期以来，武陵民族关系史研究多沿袭族群溯源之思维，将区域史上的“土人”“土民”“土蛮”与土家族，“苗”“苗蛮”与苗族等同，将“客民”“客家”视为汉民，然后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变迁。如此，武陵地区各民族不仅成了理所当然之存在，而且“世系”清晰，关系明确。本文对民国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的研究说明，真实历史并非如此。

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既有汉民，也有“苗瑶”“土民”等非汉族群。土著汉民主要是清及其以前迁入的，历经长期的土客融合，他们大多业已落地生根。土著“苗瑶”“苗”“土家”等非汉族群则经历了从“蛮夷”到“少数民族”的转变。经济长期交融的非汉土著尽管风俗丕变，但他们仍是有别于汉的社群。特别是“土民”“土家”等称呼，在区域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内涵。湘西“土人”“土民”“土苗”尽管被时人当作“苗”，但他们不是一般的土著，而是与“苗”“汉”并称的族群。鄂西南的“土家”则是土司后裔，是特别的“土著土人”。渝东南的“土人”并非专门的族称，而是当地一般的土著。黔东北的“土民”是非汉土著之概称，“土人”是“土民”之与土著相比，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客民主要是因战争、营职或传教等因素迁入的。伴随着他们的迁入及国难当头时的凝聚，武陵地区土客关系得到较快发展，形成了族群间“战时”的和谐共生局面。族际通婚尽管存在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局限，但土客通婚日益普遍；文化交融尽管以土著客化为主，但二者的交融日趋紧密；经济上的繁荣尽管是“战时”的，但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融合与发展。

笔者研究认为，武陵民族关系史研究不能简单套用以汉人与少数民族遭遇作为历史演进起点的叙事框架，更不能根据今日民族之状况僵化地倒推历史，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区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应以空间、历史、人群为切入口，全面、深入、动态地研究各民族的形成、演变及其关系。如此，武陵民族关系研究才能跳出“就民族论民族”的窠臼，武陵民族关系史才会

立体化、生动化、多元化。

参考文献:

- [1] 沈瓚, 李涌, 陈心传. 五溪蛮图志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 [2] 湖南法制院.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 [M]. 劳柏森, 点校.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6.
- [3] 凌纯声, 芮逸夫.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M].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78.
- [4] 伍新福. 湖南民族关系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5] 管维良. 重庆民族史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2: 369.
- [6] 湖南省政府. 湖南全省社会调查 [M]. 长沙: 湖南省政府, 1934.
- [7] 恩施地委统战部. 恩施专区土家族情况 [M] // 彭政坤. 历史的记忆.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3: 73.
- [8]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湘西州志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9]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恩施州志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10] 王勇. 湖南人口变迁史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403.
- [11]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志·民族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1.
- [12] 傅角今. 湖南地理志 [M]. 武汉: 武昌亚新地学社, 1933.
- [13] 政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湘鄂川黔边区名镇 [M]. 内部资料. 吉首: 湘西州政协, 1993: 36.
- [14] 刘兰英. 天主教在土家族中的传播与影响 [J]. 中国天主教, 2014 (2).
- [15] 王平.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J]. 三峡大学学报, 2008 (5).
- [16] 石启贵.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17] 陈济涛. 酉阳苗族调查 [J]. 川边季刊, 1935 (2).
- [18] 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黔江县志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69.
- [19] 贵州省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仁市志 (上)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407、678-679.